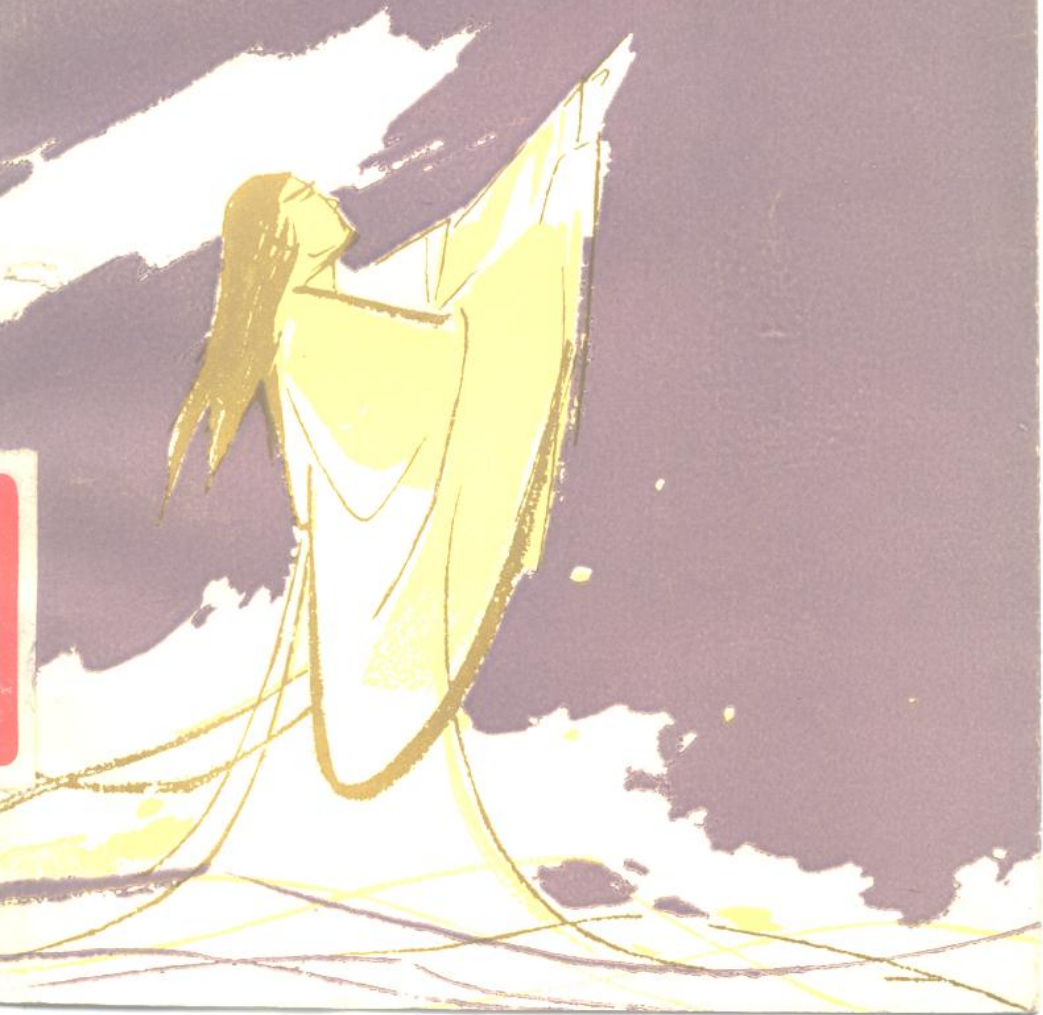


郭沫若历史剧 《屈原》诗话

黄中模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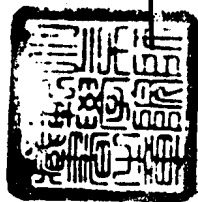
1207.22/40



一九八一年·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

黄中模 编著



798913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98913

封面题字：于立群

封面设计：曹辉禄

责任编辑：戴安常

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75 插页8 字数130千
1981年2月第一版 1981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360册

书号：10118·390

定价：0.87元



一九四二年《屈原》在重庆演出剧照

婵娟：张瑞芳饰（前）

子兰：丁然饰（左一）

屈原：金山饰（中）

宋玉：石羽饰（右一）
孙坚白

仆夫：周峰饰（上）



金山饰屈原



张瑞芳饰婵娟



白杨饰南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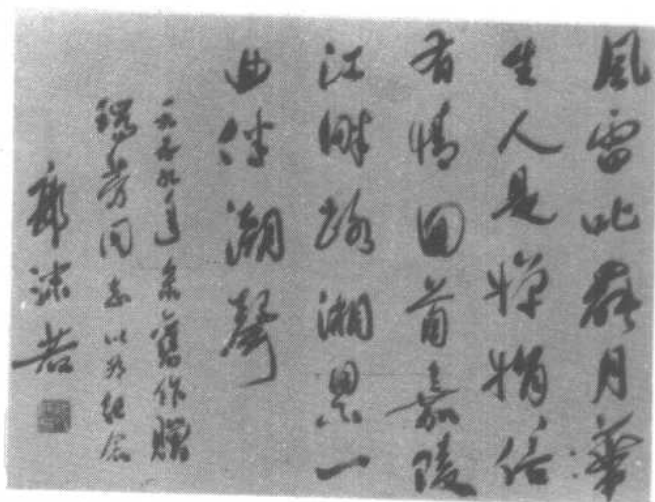
孙坚白饰宋玉



丁然饰于兰



屈原(金山饰)与婵娟(张瑞芳饰)



郭沫若诗赠张瑞芳手迹

Figure 11

東皇大一新三王致。上第二室爲空無同。正殿
面。唯左側有三尊是神靈。中向而神見
不事。後復從安身爲像者如左。正中東皇太一
右手中執玉盤。其前左右二側各有一尊跪伏。
左手東皇降焉。左手河伯奏龍。兩斜向。其首
向左。龍首向右。左右二室各供二尊。左室光
一龍蛇。湖君生於水中也。謂天八王蛇尾無枕
左室裝一片雲彩之上。爲大司命小司命。左
室皆以有靈。其意也。明。皇太子與弟及妹。皆有
大具也。

[illegible][illegible]

《屈原·雷电颂》手稿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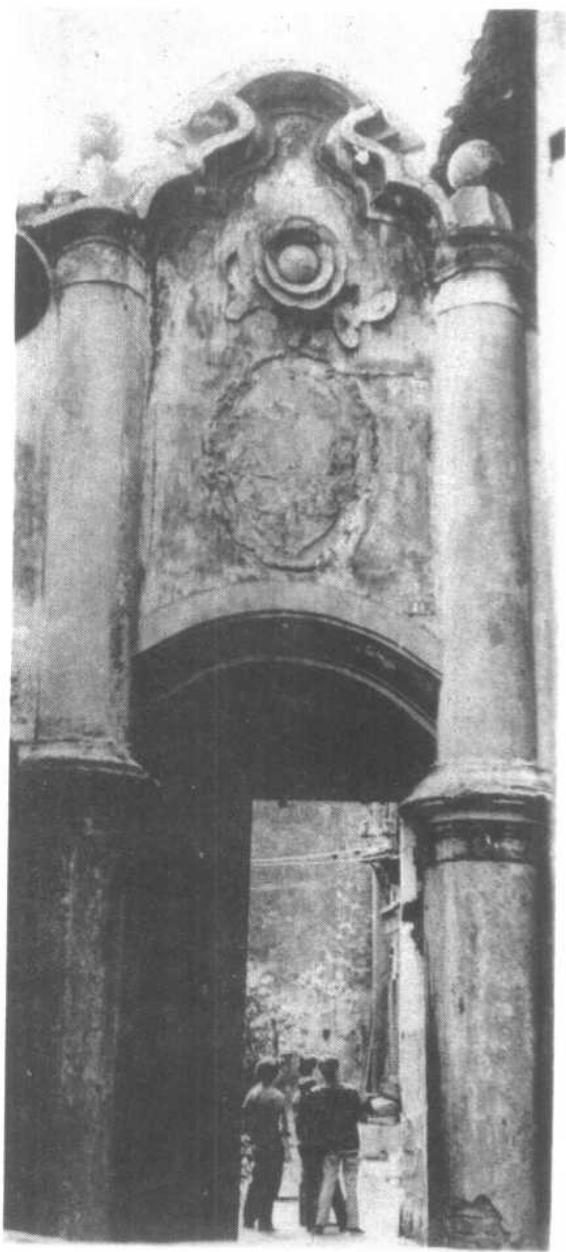
去張良吃酒時
 學王侯然睡夢中叫喚！不能他死了的吹活轉來
 不該吹轉這七條道還靈靈靈靈！但個多夢可以吹
 走一些度靈靈靈，靈靈可以吹動一些樹木。這可
 以使個靈靈，使長江，生靈萬物，皆能翻波逆浪
 和與一同呼喝呀！

所有忠臣和同僚們，多忠孝節義之士，
在那裏，的法之書々和新也海的歌呀！
也海的歌呀！的力呀！的自由，的是新呀！
是新呀！

[illegible]

《屈原·雷电颂》手稿之二

重庆天官府
25号，是郭沫若
当年办公处，周
总理曾在此设宴
庆祝《屈原》，
演出的胜利。



東江老柳濕秋新
 離舟江上何處有
 刀向月中一割傷
 回首萬年秋意均
 清痛如雪滿
 詩話誰傳出蜀州

題郭老歷史劇《屈原》詩話



未許荃椒混棘花，
 汨羅青石墜离忱。
 澄江仗劍呼雷電，
 清夜磨刀問斗牛。
 一割傷心千古恨，
 几番回首万年秋。
 灵均隱痛成遺迹，
 詩話誰傳出蜀州。

題郭老歷史劇《屈原》詩話

柳倩 一九七九年元月

周总理与历史剧《屈原》

——关于围绕历史剧《屈原》的一场激烈的斗争

历史剧《屈原》，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的优秀作品。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公演。《屈原》的出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作斗争的产物。它在公演前后，遭到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恶毒的谩骂和攻击。广大革命文化工作者，在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围绕着《屈原》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是在国统区同国民党作斗争的一次大的战役。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国统区进步文艺被他们污蔑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继续”，“中华剧艺社”也被他们攻击为“别动队”，在“中华剧艺社”里演戏的同志是“举黑旗”，^①妄图借此来反对敬爱的周总理。鉴于在过去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中，对当年围绕着历史剧《屈原》而进行的这场斗争，没有提到或是没有深入的论述，因此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为了反映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党的南方局领导的这场斗争，回顾周总理、董必武、郭沫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国统区的战斗业绩，学习和研究郭老写《屈原》的革命精神和创作经验，批判“四人帮”污蔑国统区进步文艺运动的谬论，本书收集了关于这场斗争的史

^① 见附录一：访问张瑞芳同志的谈话记录。

料，其中包括大量文章和百余首有关《屈原》的唱和诗，又在广泛调查、访问和研究的基础上，选出大部分诗作加以论述，写成了《〈屈原〉诗话》。

《屈原》产生的时代背景

《屈原》产生的时代，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五个年头，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国统区的政治斗争形势是极为复杂的。在国际上，反法西斯战斗正处于艰苦的时期。国内的抗日战争也处于极其困难的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斗争极其尖锐。当时，蒋政权自迁都重庆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政治诱降的勾引下，逐步推行了反共投降的政策。国民党亲日派为了积极反共，准备投降，连续不断地发动了反共高潮。

在军事上，他们企图为投降扫清道路，以内战代替抗战，以投降代替独立，以分裂代替团结，以黑暗代替光明，竟于一九四一年初，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出动了大量军队，在皖南茂林地区，杀害了我新四军九千多名抗战健儿。

在政治上，他们加紧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对革命人民实行法西斯的黑暗统治。竭力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狂叫“军事与民主不相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等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他们不但对《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公开机关和公开人员进行封锁和监视，派遣特务进行包围和跟踪，而且对倾向进步的民主人士也进行种种迫害。

在文化上，他们大肆鼓吹所谓三民主义文化，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专门成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颁发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抗

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在“皖南事变”以后，又查封了《救亡日报》、《全民抗战》等几十种进步报刊，许多书店也被捣毁封闭。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遭受了种种迫害。在郭沫若同志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被迫改组之后，虽然他在名义上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而实际上正如郭沫若同志说的，这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只不过是国民党当作一个民主“花瓶”来作摆设而已。郭老本人也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包围和监视，正象郭老后来描写的那样：“抗战期间，特别是重庆的几年，完全是生活在庞大的集中营里，七八年间，足不能出青木关一步”。

在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化进行大规模的、空前野蛮的摧残的同时，又通过他们豢养的文化人，掀起了为法西斯主义服务的各种宣传活动。当时的“战国策”派宣传的“力的政治”、“民族文学”，反动剧本《野玫瑰》的演出，就是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标本。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和国民党积极进行反共投降活动的情况下，国统区无数革命战士被杀害，许多文艺工作者被投进监狱与远走他乡。大后方出现了“生民离散国阡危”的状况。

为了粉碎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以后，我党中央领导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当局作了坚决的还击。在军事上、政治上对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政策受到了严重打击。我党的正义主张和坚决斗争，受到了国际国内广大革命人民、民主党派和友好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迫使国民党顽固派更加陷于孤立。正如毛主席在总结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的：“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但是对国民党

顽固派的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由于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的指示，取得了成绩，抗日爱国民主运动有了大的发展。

皖南事变以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具体计划并部署把文化界力量作了妥善的安排和保护。这就是把一些已经暴露、不能继续在蒋管区工作的同志送回延安或送到新四军去参加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把一些已经不宜留在重庆，今后还能够继续工作的同志和朋友，送往香港或其他地区工作；还有一些可以留在重庆，或是必须留下的，就继续在山城坚持战斗。

留在重庆的文艺工作者，许多同志都在郭老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里工作，所以当时“文工会”是一个主要的战斗堡垒。

这些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围绕着历史剧《屈原》同国民党展开了一场论战。关于历史剧《屈原》的诞生及其论战，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有密切关系：

一、周恩来同志决定利用话剧来作为击败国民党高压政策的突破口，是进行《屈原》这场论战的基本战略思想。

国民党对文化界的法西斯统治是极其残暴的，为了使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并保证斗争的胜利，因此突破口的选择极为重要。周恩来同志常说：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青人，影响比较大。鉴于话剧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重庆《新华日报》非常重视戏剧评论和戏剧宣传工作。在报纸上刊登了许多戏剧评

论文章，凡是描写反帝反封建的或者是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的作品都给予鼓励。若是宣传卖国投降、进行反共和搞分裂的作品，一定严肃批判。“皖南事变”后的雾重庆，各方面都死气沉沉，唯独话剧演出比较活跃，出现了中国话剧运动史上空前的盛况。历史剧《屈原》就在这样的历史斗争背景下产生的，围绕着《屈原》同国民党的斗争，则是双方在突破口上的一场尖锐而激烈的战斗。

二、“中华剧艺社”的成立，为进行这场斗争作好了组织准备。

在突破口选定之后，能否组织一支有利于战斗的戏剧演出队伍，这是关系着斗争成败的决定因素，因此“中华剧艺社”应运而生，担负着特殊使命。

当时的话剧运动，本来随着三十年代左翼戏剧运动的开展，已经形成了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但是由于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戏剧界的力量，有的已经离开重庆，而一些新生力量，又多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剧团里工作，所以戏剧演出队伍有加以重新组织的必要。

在重庆，由于战争的原因，当时的胶片少，电影生产很困难，所以许多电影导演、演员和编剧都逐渐转到话剧上来。在国民党军政系统控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演戏的剧团和三青团控制的“中国青年剧社”（简称“中青”）里，许多人都是在党的影响下进行工作。这些同志和革命的朋友，在这三个地方想演进步戏剧要受到刁难和限制，心里有很多气。周恩来同志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认为应该利用国民党控制的文化机构和团体，通过对剧作家、导演、演员做工作，把话剧这一武器夺过来，为我所用。所以决定除一方面利用这些团体以外，还指示文艺界的地下党组织，筹备建立党直接领导下的剧团，来进行反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进步戏剧活

动。周恩来同志还指出，在反击时，要针对国民党进行反共投降、搞分裂活动，特别是要暗中针对“皖南事变”来进行反击。

在一九四一年以前，重庆的戏剧舞台上，由于国民党的压制和迫害，直接揭露和批判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戏剧作品是不多的。当时出现的四十多种剧作中，大多是描写军民抗战斗争，揭露日寇敌伪丑态的作品。一九四一年初《雾重庆》上演，这个戏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周恩来同志看了很高兴，这使在文艺界作具体领导工作的同志看到了方向。文艺界党的组织便决定从“中制”、“中电”、“中青”三个团体里动员一批力量，与另外一些同志，组成“中华剧艺社”（简称“中艺”）。

为了不使“中艺”的活动受到国民党的刁难，经过慎重研究和选择，由党外人士来作“中艺”的负责人，因此“中艺”表面上是一个民营剧团，而实际上它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从事进步戏剧活动的团体。

郭沫若同志很重视和支持“中艺”的工作。当听到要成立“中艺”时，郭老非常高兴地说：要干，我们没有一个演戏的团体，怎么能演反对国民党的戏呢？因此郭老在《新蜀报》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一日刊登的《“中华剧艺社”成立特刊》上，发表了题为《戏剧运动的展开》一文，以表祝贺。郭老在文中认为戏剧“对于社会，对于抗战所贡献的效果，我们相信也绝不会是微末的。……实在应该加紧戏剧运动的展开，多多组织剧团，多多培养干部，多多编制新剧本，多多从事演出”，使戏剧运动成为“五光十色的灿烂的世界”。郭老的这篇文章，对“中艺”成员是巨大的鼓舞。

“中艺”成立以后，就为纪念郭沫若同志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演出了郭老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后来又演出了《屈原》和其它许多进步戏剧，宣传我党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活动。